

江南文化及城市研究的学理反思与学术重构

刘士林

摘要:在开展具体的历史研究之前,首先需建构一个基础性的“文化理论”,这种“基础理论研究”会直接影响到“历史研究”的“结论是否可靠”以及“有何当代价值”。通过对江南文化基本概念、范畴体系、学科框架的研究和建设,促进不同学科、不同门类视界融合与综合创新,以“整体研究”规范和引导“单体研究”,把江南文化研究提升到系统和整体的理论高度。这不仅决定着江南文化研究自身能抵达何种学术境界,也决定着这项研究对长三角一体化实践可以提供何种智力支持。进一步加强和深化江南文化和城市研究,一是要注重处理好“历史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实现江南文化与城市研究“事实与价值的统一”;二是要准确把握“学术定位”和“现实定位”的关系,实现江南文化与城市研究“理论与实际的统一”;三是要积极理顺“大处着眼”和“小处着手”的关系,实现江南文化与城市研究“出乎其外与入乎其内的统一”。

关键词:江南文化;江南城市;学术反思;理论构建

DOI: 10.19836/j.cnki.37-1100/c.2021.04.007

2020年11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要把长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①。长江和黄河同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同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长江下游的扬子江是长江最重要的河段,以扬子江为重要轴线的江南地区是长江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江南文化是长江文化最有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空间上与江南地区基本吻合、在人文上与江南文化一脉相承,长三角城市群稳居长江经济带三大国家级城市群之首,以江南文化的现代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促进长江文化保护传承弘扬,以江南文化引领长三角区域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已成为三省一市的文化共识和发展趋势。但江南文化如何实现现代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江南文化如何引领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目前尚缺乏深入的理论基础研究。基于此,为了回答“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等重大问题,推进江南文化在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迈上新台阶,文章就如何深化江南文化与城市的基本问题研究和理论体系建设提出一些见解。

一、传统江南文化与城市研究的主要流派及其问题讨论

依托优美的自然景观特色和深厚的历史人文积淀,江南与江南文化一直备受国内外、多学科的专家学者的青睐和重视,是我国区域经济、社会和文化研究中一个独具魅力、不可多得的重要研究对象,并历史地形成了三大主要学术流派,它们既取得了众多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同时存在着各自的局限和问题。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运河文化建设研究”(19ZDA186);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江南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研究”(20BH153)。

作者简介:刘士林,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首席专家,教授,博士生导师。2004年12月至2006年12月,在山东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① 《习近平主持召开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http://www.gov.cn/xinwen/2020-11/15/content_5561711.htm, 访问日期:2021年4月20日。

一是以文献编纂与考据为中心的文献研究。它们或是卷帙浩繁的集大成著述(如江苏古籍出版社的《江苏地方文献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西湖文献丛书》,浙江古籍出版社《杭州全书》等),或是某一专学的资料汇编(如江苏古籍出版社的《明清苏州农村经济资料》,黄山书社的《江南女性别集》,上海辞书出版社的《中国明清江南服饰图典》等),为江南文化和江南城市研究提供了大量真实可靠的文献资源。但是问题在于,由于文献研究主要倚重传统的“小学”理论方法,缺乏现代学术意识和当代文化理论指导,关于江南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更是很少触及,因此文献研究只是走完了江南文化研究“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如何在这个基础上“接着讲”则是当下亟待思考和解决的学术发展问题。

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大多数传统学术研究面临的共同问题。从学术研究传统和范式看,任何一种学术系统的形成和传承,都有属于自身的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学术语境。这种背景和语境既是一门学科得以确立的基本条件,同时也使其因此形成了难以逾越的“门户”意识,而不再跟随时代背景的变迁和学术语境的变化。一般说来,越是相对成熟、定型的人文学科,就越不容易走出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话语圈子”。对于江南文化文献研究而言,一方面直接继承了乾嘉时期江南地域十分发达的考据学传统,另一方面也受到现代中国“为学术而学术”思潮的影响,其主要问题是局限于“历史真实”而未能抵达“历史的精神真实”,并造成了“历史文献学与精神现象学的两相分离,即历史研究(‘史实’)同历史上的生命活动(‘诗意’)相疏离”^①。在传统文献“读书识字”的扎实基础上,促进“学主知”与“主术行”、“义理、考据、辞章”与“为学的目的”^②的互动融合,不仅有助于推进江南文献研究自身的革故鼎新,也可为整个传统学术更好地融入现代社会进程作出积极示范。

二是以经济史与社会史为中心的史学研究。在经济史方面包括江南经济史、断代江南经济史、太湖流域商品经济与市场、江南乡村地权、城市手工业等领域;在社会史方面涉及对江南城市通史、江南社会与社会生活研究、江南望族研究、江南丝绸史、江南佛教史、江南民风风俗等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讲,江南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既与“史学”在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中占据的重要位置密切相关,如钱穆先生所说:“故求深切体会中国民族精神与其文化传统,非治中国史学无以悟入。若如宗教、哲学、文学、科学其他诸端,皆无堪相伯仲,相比拟。”^③同时也深受近代中国一直占据主流的“六经皆史”乃至“六经皆史料”(即作为古代典籍代表的六经“只是一大堆预备史家选择的原料”^④)以及各种西方实证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滥觞的影响。无可否认的是,史学研究极大地拓展了江南文化研究的视野,丰富了其内涵,但受学科属性与学术范式的影响,他们一般也很难处理好“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的辩证关系,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偏经济而轻人文”“偏科学研究而轻价值阐释”等问题和倾向。

实际上,前人对这种“重事实轻价值”的研究方法已有所警觉,如国学大师陈寅恪提出的“诗史互证”方法,是一种融汇诗学文献与历史文献为一体、相互补充又相互印证的阐释方法。陈寅恪先生或者用它来纠正旧史记载的错误,或者用它来补充传统史料记载中的缺失,而且达到了可以使千载之前的社会和精神生活如在目前的精深境界,成为现代学术研究的一种典范。参照“诗史互证”的基本方法,我们曾提出要建立一个“诗性人文学术方法”。其要点有二:首先,正如马克思说:“现代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他们在自己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起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⑤由此我们认为“以文学艺术为主要材料与对象的诗性人文学术,不仅以独特方式记录和阐释着人类社会与文化的发展,在某些层面与局部还更深刻

① 刘士林:《从历史真实到历史的精神真实》,《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2期。

② 刘梦溪:《学术与传统》(上卷),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7年,第376-377页。

③ 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06-107页。

④ 朱维铮主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33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86页。

地揭示了其本质与规律,因而,诗性人文学术有着其他实证性社会科学无法替代的功能与作用”^①;其次,在马克思看来,在唯物主义第一个创始人培根那里,“物质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但在以后的发展中却变得片面,“感性失去了它鲜明的色彩,变成了几何学家的抽象的感性……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类了”。^②由此我们提出“以感性经验与诗性智慧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诗性人文学术,是对唯物主义真实面目的回归与精神境界的拓展”。因此,诗性人文学术“有助于纠正过度理性化、科学化与实证化的现代主流学术范式,对于更好地实现学术研究的人文关怀十分必要与重要”^③。因此,在江南文化研究中,以“经济研究”和“社会研究”为基础,补充和加强“人文研究”,促进三者的融合互动,是发现一个更加真实和完整的江南文化的最重要学术路径之一。

三是江南文化与江南城市研究的西方框架及其卵翼下的中国话语问题。在西方著作翻译上,主要以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江苏人民出版社的《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江苏人民出版社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等为代表,并以其特有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深刻影响了国内的相关研究。在国内学术界,主要以人民出版社《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中华书局《宋代江南城市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江南的城市工业与地方文化》、复旦大学出版社《江南市镇:传统与变革》、高等教育出版社《江南城市群文化研究》等为代表,在推动江南文化和江南城市研究的深化上发挥了积极的重要作用。但是问题在于,由于这些研究的理论工具主要来自西方,加上人们在使用时对其解释江南文化与江南城市经验的合法性缺乏足够的论证和必要的修正,因而在一些结论和判断上存在着不少值得商榷和讨论之处。在江南文化研究领域,坚定文化自信,推进中国话语和中国学派自觉,合理吸收西方城市和文化研究理论与方法,扬弃其片面性和糟粕,立足于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的时代高度,构建具有世界价值、中国意义、时代特色、区域特点的理论话语体系,是深入推进江南文化与江南城市研究需要重点关注和探索解决的。

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20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理论与方法在解释中国经验时存在的普遍问题。按照一般的理解,西方理论与方法源自西方民族的历史实践,前者对解释后者具有完全的合理合法性。而至于这些理论与方法是否适合其他民族,则需要有一个论证和检验的过程。在研究中国都市文化时,我们曾提出要以“区分中西”为原则,探索和建构适合中国的学术语境,认为“尽管西方城市社会学等知识体系十分发达,是研究中国都市文化最重要的理论资源与方法工具,但它们基本上是对西方城市历史经验的理论总结,由于中西文明在城市起源、历史形态、精神传统以及当代城市化的条件与背景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其解释中国都市经验的合法性是特别需要小心论证的”^④。关于这些问题,前人已经注意到了。如冯友兰先生指出:“东方之长在能阐明物我一体之理,有精神的大我以笼罩一切个体,而其弊在抑制欲望冲动;西洋在满足欲望冲动,而其弊在只有个体而不知有大我,人与人之间只有外的关系而无内的关系。”^⑤与现代西方城市主要走以大城市为中心发展道路不同,在中国南宋时期,“大都市人口集中的程度已达极限,新的发展趋势是形成大都市附近的卫星市镇,让大都市去担负行政功能,而由新兴的卫星市镇去分担日渐加重的商业功能”^⑥。在城乡关系上,与工业化以前的欧洲城乡区域之间往往截然分开不同,牟复礼在研究明清苏州城市史时曾指出中国的城市和农村是相互开放的,没有明显的空间利用方式使两者相互隔绝开来^⑦。当然,这绝不是要完全排斥西方理论,

① 刘士林:《建构江南城市研究的诗性人文学术谱系》,《学术月刊》2008年第8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63-164页。

③ 刘士林:《建构江南城市研究的诗性人文学术谱系》,《学术月刊》2008年第8期。

④ 刘士林:《江南都市文化的“文化理论”与“解释框架”》,《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⑤ 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7页。

⑥ 赵冈:《论中国历史上的市镇》,《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2期。

⑦ 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383页、第384页。

而是要以开放包容的学术胸襟和更加严谨求实的学术作风,推进“西方江南研究”与“中国江南研究”融合与协调发展。

由上可知,传统江南文化研究由于自身的历史和学术局限,已远不能适应当今长三角一体化对其区域文化资源提出的现实需求。在充分吸收和借鉴传统研究的基础上,开展一种独立、系统、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发展、能在推进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江南文化与城市研究,是一个需要大力开拓和深入探索的重大学术领域。

二、当下江南文化与城市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分析

近年来江南文化与城市研究的“热”,既与明清时代江南地区高度发达的城市经济和文化相关,也是当今长三角地区在国家发展大局中战略价值不断提高的必然反映。

就前者而言,正如著名的马可波罗对苏州、杭州这两个江南中心城市的感受和认知:“在蒙古征服者统一全国并将国都重新迁往北方以后,马可波罗游历到这一地区,发现苏州‘是一个巨大而且宏伟的城市……居民之多,令人叹为观止’,这个城市以贸易和手工业发达著称,同时也是学术中心。然而,当马可波罗四天后到达南面的杭州的时候,他这样形容:‘这是一个世界最富丽、名贵之城,又谓之‘天上城’。行在城之高贵、美丽,以及给当地居民的快乐,世界诸城无有所及,人在其中,自信身在天堂。’”^①另一位著名的汉学家施坚雅则从全球化的学术视角,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讨论,他说:“东西方学者都一致同意,至少在16世纪之前,苏州已经成为中古时期最富裕、城市化程度最高和最先进的经济文化中心。而且它一直作为中心大城市整合并支配这一地区直至19世纪。”^②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中国近代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在长三角地区萌芽最早、发育最好并一直延续至今的社会土壤。

就后者而言,其主要标志有五:一是2008年国务院提出长三角建设“世界级城市群”,江南地区随之被推到当今世界舞台的中心;二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提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开启了这个中国当代经济高地的文化转向和探索之路;三是2018年上海市将江南文化列为打响文化品牌的重点任务,为长三角三省一市确立了共同的文化价值纽带和共有精神家园。四是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为新时代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确定了方略和目标。同时提出“共同打造江南文化等区域特色文化品牌”,首次就长三角区域文化建设作出战略设计和安排。五是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提出“要把长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江南文化是长江文化最有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被赋予了更加重要的使命任务。但与快速变化、发展着的现实进程相比,关于长三角的思想文化理论研究却远远没有跟上。这是人们一般只能照搬照抄西方文化与城市理论,同时也是在实践中经常“跟着感觉走、拍脑袋决策”的深层次原因。在学术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会直接影响到江南文化和城市的发展。特别是与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提出的文化需求和期待相比,当下的江南文化与城市研究主要存在以下结构性的问题和矛盾,必须要通过理论研究和学术创新尽快地加以解决。

首先,在结构上看,是“历史研究”强势而“理论研究”羸弱。这与历史主义学术史观在现代中国学术中的兴起以及传统经学学术史观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体系性崩解直接相关。“如果说经学学术史观旨在‘求善’,一切对天人、物理、历史、文献等的解释,目的全在于维护封建伦理道德,即‘经夫妇、成孝敬、后人伦、美教化、移风俗’;那么史学解释学的目的则在‘求真’……即把被经学夸大、抽象、扭曲、道德化了的历史,恢复为其本来面目。如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它就超越了‘本经立义’的规范,不是用

^① 林达·约翰逊主编:《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成一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序言”第2页。

^② 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上海:中华书局,2000年,第3页。

经书记载,而是用地下出土文物,去检验或复原真实的历史本身。”^①这个巨大的学术史背景,是江南文化研究中“历史话语”格外强势和庞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客观说来,在促进中国学术从传统向现代形态的转换中,历史主义学术思潮曾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但是问题在于,历史本身并不只是一大堆“史料”,还包含了理解历史进程的观念、整理历史文献的工具、解读历史规律的方法和建构历史体系的价值立场。正如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和现实之间并没有“硬的界限”,过去的一切也不会和活生生的当下截然区分开,因此那种历史主义自诩的“回归历史本身”及“价值中立”本身就是不存在的。相反,如果在研究中过于排斥现实关切和时代价值,则必会导致伊格尔顿所说“在科学的名义下,知识不再负载伦理和审美的作用,也开始失去了与价值的联系”^②。正是基于这一思考,我们曾提出研究历史需要从“对主体思维方式的清理”开始,认为“从清理材料到清理思维,它是一种向历史深处的进军。”^③即如果不先把关于历史的观念和价值问题搞清楚,实际上也是无法开展真正的历史研究的。对于江南文化与城市研究来说,就是在开展具体的历史研究之前,首先建构一个基础性的“文化理论”,这种“基础理论研究”会直接影响到“历史研究”的“结论是否可靠”以及“有何当代价值”。

其次,从学科上看,是“单体研究”热闹而“整体研究”冷落。当下的江南文化与城市研究主要依托文学、语言学、历史学、艺术学、社会学、经济学、建筑学、地理学等相关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并天然划分出江南文学、江南诗歌、江南绘画、江南舞蹈、江南音乐、江南戏曲、江南民俗、江南工艺、江南科技、江南经济、江南城市、江南乡村、江南社会、江南水利等各个研究领域,一直以来人们也习惯于把这种“单体研究”等同于“整体研究”,或者是认为把它们汇编在一起就完成了所谓的“江南文化研究”。但由于不同学科在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上差异很大,就很难在一些基本问题上达成共识或系统认知。这在某种意义上是现代社会的过度“专业化”的必然结果。如怀特海所说:“每一个专业都将进步,但它却只能在自己那一个角落里进步。在思想上限于一隅……社会的专业化职能可以完成得更好、进步得更快,但总的方向却发生了迷乱。”^④

在这种知识生产的大背景下,即使有一些综合性的研究与跨学科的探索,也由于缺乏基础性的总体理论框架规约而乏善可陈。其中最典型的是关于江南文化的概论性研究,如时下为数并不算少的越文化、吴文化、海派文化、徽文化等概论研究,基本上都是把所涉及的不同学科的知识 and 成果汇编在一起,并以此等同于“江南文化研究”或某个片区的文化研究。但如果我们把江南文化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由系统论“系统大于部分之和”这一基本原理可知,江南文化“整体研究”绝不等于各部分研究的机械叠加或简单组合。这与当下中国文化研究“缺乏核心范畴又没有逻辑系统”的基本情况一致,它导致的是把文化研究变成了从时间角度来排列历史生活现象,而不是从逻辑角度去重建一个完整的可理解的历史有机体。因此,要想有效改变“单体研究热”而“整体研究冷”的现状,首先需要把“单体研究”和“整体研究”的差异搞清楚,避免后者被前者取代。当然,“单体研究”和“整体研究”有内在联系,前者也为后者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在当下真正重要和紧迫的是如何以“单体研究”的丰富成果为基础,通过江南文化基本概念、范畴体系、学科框架研究和建设,促进不同学科、不同门类视界融合与综合创新,以“整体研究”规范和引导“单体研究”,把江南文化研究真正提升到系统和整体的理论高度。这不仅决定着江南文化研究自身能抵达何种学术境界,也决定着这项研究对长三角一体化实践可以提供何种智力支持。

再次,从内容上看,是“实用研究”过剩而“人文研究”短缺。出于满足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

① 刘士林:《先验批判》,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43-144页。

② 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王杰等译,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1997年,第366页。

③ 刘士林:《先验批判》,第147页。

④ 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何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88-189页。

需要,当下各种应用型研究报告、政策建议类成果备受青睐,几乎每个地方政府都组织出版各种经济社会发展报告,相关高校、科技机构和社会智库的咨询、策划研究更是不计其数。这些应用研究的主要问题有两方面:一是“急功近利”的问题。由于缺乏基础理论指导同时又急于服务现实需要,不少研究都属于“应急式”“圈地式”的“速成品”,如一些城市资助支持的相关“排行榜”,或是为争夺文化资源而挑起的各种“口水战”,其中普遍存在着浅尝辄止、囫囵吞枣、浑水摸鱼等突出问题,它们不仅严重损害了江南文化的总体和长远利益,也直接影响到对江南文化真精神和真价值的认知和接受。二是受其学科性质、研究范式、价值取向等影响,这些实用研究最容易犯的毛病则是所谓的“见物不见人”。借助“量化”“标准化”“大数据”“算法”等当代学术“口实”,这些研究直接牺牲了江南文化最宝贵的诗性和审美精神。

正如我们一再强调指出的,江南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诗性文化,具有独特而重要的“经世致用”价值。与西方建立在感性与理性、主体与自然二元对立基础上的理性文化相比,以“物我无对”“民胞物与”等为基本观念和价值的诗性文化,不仅在应对人与社会的矛盾时,能较好控制个体与群体的冲突程度,同时在应对人与自然的矛盾时,也能避免天人关系走向彻底的分裂与对立,在全球生态危机和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加剧的背景下,诗性文化为构建一种真正包容性和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提供了理念和智慧。与以政治—伦理为深层结构、主要强调义与利、经济和伦理的斗争关系的“中原文化”相比,以经济—审美为基本理念的“江南诗性文化”善于处理和协调“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社会和个人”的矛盾关系,有助于构建物质追求与精神需求、功利主义与审美主义的协调机制,可以为实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协调发展贡献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但这种真正具有现代性价值的学术研究与探索,在过于实证化的相关社会科学研究中基本上是不见的。而如果继续认为这种“实用研究”就是“江南文化研究”,则完全有悖于开展江南文化研究和建设的初衷和目的。由此可知,如何在江南经济、社会、金融、科技等“物质条件”充分研究的基础上,按照精神生产和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和要求,进一步强化和深化江南文化和城市的人文研究,发现和确定江南文化与长三角城市群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实施的契合点与纽带,不仅最终决定了江南文化和城市研究能够走多远、迈上何种境界,同时也可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促进和引导长三角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命运共同体”发挥重要作用。

三、深化江南文化和城市研究要处理好的基本关系及其旨归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篇》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白居易《与元九书》中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2019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为新时代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确定了方略和目标。同时提出“共同打造江南文化等区域特色文化品牌”,首次就长三角区域文化建设作出战略设计和安排。恩格斯曾指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①其实,我们同样可以说,江南文化和城市研究的学术创新,既是传统江南文化与城市研究实现现代转型的重要表现,同时也是长三角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我们认为,未来要进一步加强和深化江南文化和城市研究,发挥好文化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在学术研究领域需要处理好以下三方面的矛盾关系,以创新性的学术理论为长三角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一是要注重处理好“历史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实现江南文化与城市研究“事实与价值的统一”。简单说来,这是一种既相互依存又相互斗争的关系。一方面,没有扎实、坐冷板凳、皓首穷经、述而不作的文献研究、文物考据、史实论证等历史研究支撑,江南文化和城市研究就会失之于空、流之于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505页。

野,缺乏坚实的文献基础和历史依据,最终沦为各种对江南文化和城市的“戏说”“乱说”乃至“胡说八道”,最终使严肃的学术研究和理论探索沦为一种“想象力的游戏”和“话语的狂欢”。在文化生态环境日益浮躁、“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当下,强调这一点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另一方面,也不能走向相反的另一个极端,就是因此将“文化研究”最关注的价值、意义、时代关切、超越理想等全盘否定,因为这些正是不仅决定着当代江南文化和城市研究的现实意义,同时也应该成为一切历史研究最后的归宿。对此最关键的是树立一种新的学术观,把“有学术的思想”与“有价值的知识”真正统一起来,同时要学会运用理论和理性的工具,把真正的学术创新和各种学术泡沫区别开。而这也是必须强化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是要准确把握“学术定位”和“现实定位”的关系,实现江南文化与城市研究“理论与实际的统一”。一般说来,任何学术研究都有两个定位、两种功能和两个空间。一个是针对学术自身而言,在基本理论问题、研究方法方式、学科知识推进、规律本质把握上作出的努力和贡献,其中最重要的研究对象和领域包括:江南概念和范围的界定、江南文化发生和历史流变的过程与机制、江南文化的精神内涵和核心价值、江南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江南文化各小传统的关系、江南文化的传播路线、江南城市与中国古代城市化进程、古代江南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的关系、江南城市与当代长三角城市群的关系等。这些基本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不仅更深入的理论研究无法开展,同时各种应用研究也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另一个是针对社会而言,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学以致用”“文以载道”和“理论联系实际”等。如果一种知识和理论只有一种“学术定位”,就很容易沦为一种自说自话、自我封闭的“智力游戏”,即使不能说它完全错误,但也可以说这是有重大缺憾的。正如蒋孔阳在评价康德和黑格尔时所说:“他们离不开的是书,而离得开的却是生活、实际和斗争。”^①对于江南文化和城市研究,对于迫切需要得到智力支持的长三角一体化进程,尤其如此。就当下而言,江南文化与城市研究在学术上的精研学理、探索新知,为一种更加纯粹的江南文化知识和理论孜孜以求,都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但同时还必须强调的是,这种纯粹理论探索不应该是最后的归宿,因为它还有改造社会、服务人类发展和文明创造的更加重要的功能和使命。因此,在现实定位上,江南文化与城市研究必然要超越“钻钻故纸堆”和“发思古之幽情”的阶段或层次,并努力为当代人提供一种理性的研究方法、观念、理论与解释框架,帮助人们在个体与社会之间建立起真实的现实联系。还可以说,这两者的矛盾冲突只是表现在某些阶段或某些局部,在双方都发展到最高境界时,这种“理论和实际”的矛盾关系就会迎刃而解,因为前者提供的客观的代表着真理和规律的知识 and 理论,恰好就是后者介入现实、改造现实最需要的理性智慧和力量。

三是要积极理顺“大处着眼”和“小处着手”的关系,实现江南文化与城市研究“出乎其外与入乎其内的统一”。在新时代提出江南文化和城市研究的命题,绝不是要回归南朝名士的“越世高谈”、南宋时期的“西湖歌舞”、明清文士的“诗酒行乐”、近代十里洋场的“纸醉金迷”,而是有着最重要、最迫切和最强烈的时代需要。党的十九大指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制定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充分用好用活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资源,大力弘扬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城市精神和开放、创新、包容的城市品格,更好传承传统文化精髓、吸收世界文化精华、展现都市文化精彩,加快建设更加开放包容、更富创新活力、更具时代魅力、更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国际文化大都市”。由此可知,在“十四五”乃至到2035年,推动江南文化和城市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实施提供强大和可持续的精神资源和力量,已经成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重点篇章。这就要求江南文化和城市研究,必须走出学术和理论研究的“象牙塔”,置身于新时代区域发展重大国家战略的广阔天地中。但同时也要看到,为了能够更好地回应时代需要、承

^① 蒋孔阳:《德国古典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06页。

担使命任务,江南文化与城市研究又需要更深入地“入乎其内”,以绣花功夫和工匠精神开展更为基础、更加扎实的学术研究和理论探索,力避浮泛化、空洞化和庸俗化,切实促进江南文化学术研究和江南文化战略实施的融合发展。这就需要既从“大处着眼”,自觉意识并主动承担起打造江南文化品牌、助力长三角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使命,同时又要做到“小处着手”,注重吸取传统的“小学”、史学、文献学、考古学等理论方法,在考据、训诂、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去伪存真、实事求是等方面下笨功夫、苦功夫,真正做到“板凳宁坐十年冷 文章不写半句空”。目前,为了在国家战略中抢占有利地位,一些城市和学者急功近利、捕风捉影、张冠李戴、以讹传讹的研究层出不穷,在江南文化起源、历史分期、空间范围、文化名人故里、江南运河资源归属等方面,已经出现了不少的伪知识、伪命题、伪学说等,这些虚假的东西如果不能得到清理,历史的真实和真相如果不能大白于世,实际上不仅无助于长三角国家战略的实施,还会制造一大堆新的问题、矛盾和后遗症,成为影响长三角区域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障碍。就此而言,加大力度推进江南文化理论构建与学科建设,努力做好江南文化传承创新的各种基础性工作,为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提供思想理论方面的基本保障,已经具有了越来越紧迫、越来越重大的现实意义,亟须提到历史议程上来。

The Academic Introspection and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Jiangnan Culture and Urban Studies

Liu Shilin

(Institute of Urban Scienc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P.R.China)

Abstract: Prior to carrying out a specific historical research, it is necessary to construct a fundamental cultural theory, which directly influences whether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is solid and what its contemporary connotation is. Through the research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basic concept, category system and discipline framework of Jiangnan culture, this paper promotes the integration and comprehensive innovation of different disciplines and categories, standardizing and guiding the “single research” with “overall research”, and elevates Jiangnan cultural research to a systematic and overall theoretical level. This not only determines the academic level that Jiangnan cultural research can reach, but also decides what kind of intellectual support this research can provide to the integration practice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To further strengthen and deepen the Jiangnan culture and urban studies,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ical study” and “cultural study”. Another key point is to accurately grasp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ademic orientation” and “realistic orientation”. In addition, we should actively straighten 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inking big” and “starting small” to unify Jiangnan culture and urban studies in a rational-emotional manner.

Keywords: Jiangnan culture; Jiangnan cities; Academic introspection;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责任编辑:郝云飞]